

身份演变过程中的译者伦理变革

单宇, 范武邱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通过探讨译者身份与译者伦理的互证关系, 论述译者身份演变过程中译者伦理变革的外在表象及内在理据。译者称谓、译者主体性成为译者伦理变革的外在表象, 文本选择、翻译理论、翻译方法、翻译原则与翻译策略的特征成为译者伦理体现的内在理据。语文学时期, 译者为“奴仆”, 唯主人与原作是从, 原作者、统治者为翻译主体, 体现译者“奴性”伦理; 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 译者化身为“女性”, 文本为翻译主体, 体现译者“妇道”伦理; 解构主义时期, 译者转身为“创造性叛逆者”“混血儿”, 译者终为翻译主体, 彰显译者“职业”伦理。

关键词: 译者称谓; 译者身份演变; 译者伦理; 伦理映射

中图分类号: H5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7)06-0192-05

一、引言

“只要有人, 有了人的活动与生活, 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有伦理的存在。”^[1]翻译是建立在语言转换基础上的跨文化语言交际, 是原作在译语文化中的再现。译者作为交际活动的施事者, 在调和不同文化、语言与不同翻译主体的伦理关系中, 自身角色与伦理密切相关。译者的翻译活动是译者伦理意识下的行为, 是在处理各翻译主体间历史性、社会性与实践性伦理关系中形成的。因此, 译者的伦理意识与生俱来, 不断勾勒译者身份。译者身份是译者行为过程中的自我体现与普遍认同的总和, 体现译者的社会地位及人类对翻译活动的认识, 具有伦理特征^[2]。译者伦理是译者的行为规范与译者行为事实的代名词。

本文参照中西翻译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 按语文学时期、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和解构主义时期的发展顺序展开论述。梳理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译者伦理的流变, 侧重译者称谓变化、译者身份转变、翻译主体衍化的描写, 从文本选择、翻译方法、翻译原则三个方面阐释译者基于原文的衍生性诠释, 体现译者伦理的形式表象——译者的责任、道德与规范对译者的规

约, 阐释在三次标志性译者身份演变过程中, 译者伦理的变革、译者角色所体现的社会对译者活动的规范与期待, 诠释译者由被动走向主动、由消极走向积极、由附庸走向主体、由隐身走向显世的演变过程。

二、语文学时期的仆人身份与“奴性”伦理

语文学时期的翻译活动以宗教翻译内容为主, 译者称谓贬义居多, 常被冠以“仆人”之称, 就译者身份而言, 可归纳为被动受体——“奴仆”: 一是原作的“奴仆”; 二是统治者的“奴仆”。但无论译者的服务对象是谁, 服务目的是什么, 译者或为原作的奴仆, 受原作“奴役”, 再现神圣的文本; 或为统治者的奴仆, 再现统治者的诉求, 按统治者意图从事翻译活动, 强调译者的克己意识, 译者体现出“奴性伦理”。

(一) “仆人”称谓与身份

语文学时期, 国内翻译活动以佛经汉译为主, 翻译活动的主体为佛教经典与统治者。“译者”是无知的奴仆, “一仆二主”, 要尽心伺候原作与统治者两个主人。《春秋·谷梁传》中的“名从主人, 物从中国”^[3], 高度概括了古代翻译活动的“源语”重心。两个“从”字, 充分体现译者的从属地位, 译者需要

收稿日期: 2017-08-11; 修回日期: 2017-10-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近 30 年中美外交语言风格嬗变对比及翻译研究(1986-2015)”(16BYY023);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视阈下近代百年科技翻译教育研究”(16JD09); 湖南省教改项目“后大学英语时代‘工程人才’科学语言素养体系构建”(湘教通[2016]400)

作者简介: 单宇(1977-), 女, 湖南攸县人,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科技翻译, 翻译史; 范武邱(1966-), 男, 湖南邵阳人, 博士,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美学, 科技翻译

严格遵守翻译活动中的“主从”伦理道德。译者的匿名或以“释”为姓, 形象刻画了译者身份“释法”, 译者隐身, 地位低下。

西方语文学时期,《圣经》成为拉丁语系内部的主要翻译对象, 译者强调经文“神圣而不可侵犯”, 译者沦为“听写者”与“传声筒”, 是无主体性的附庸。罗马天主只认可“神圣的”和“约定俗成”的译文, 译文表达形式与表达方法上的任何改变, 均被视为异端邪说, 并予以严加指责。这一时期, 少数甘于冒险的解经者和译者惨遭厄运。艾蒂安·多雷不赞同逐字翻译方法, 最终被处以火刑。马丁·路德为了能让普通人也“听到神的召唤”, 将难解的拉丁文《圣经》译为通俗德文, 这种使宗教传播大众化的做法, 也同样未被接受。英国人威廉·廷代尔在翻译《新约·圣经》时, 倾向使用简单通俗的英语表达, 教会却指责他“编织爱和虚妄的历史和寓言, 以毒害青年”^[4]。

然而, 经典原著并非是译者的唯一主人, 统治者同样处于主人的地位。罗马人对希腊文化同时进行文化利用与文化掠夺, 希腊文化成为罗马统治者消遣的对象, 遭到肆意篡改。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占领。听命于统治者的译者, 表面上拥有解释原作的决策权, 实质上译者只是由原文的奴仆变成了统治者的提线木偶。

(二) “奴性”伦理

无论是宗教经典还是统治者的“仆人”, 译者的“仆人”伦理本质得以突显, 并成为这一时期译者伦理特征的微缩,“唯主是从”成为译者伦理规范, 被动受体成为译者的身份体现。这一时期的中西译者身份突显译者主体性的失落,“奴性”伦理成为这一时期译者的伦理特征。从译者翻译活动中可观其究竟: 首先是文本选取。译者无权自主选择文本, 译文选择强调宗教经典的再现。这一时期的中西译本均为宗教典籍翻译, 东方以佛经翻译为主, 西方为《圣经》翻译, 文本选择毫无自由可言。其次, 翻译方法是原文的再现。逐字翻译最为普遍, 映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深怀敬畏之心, 原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原文中任何语言单位的表达, 语序、词序甚至标点都是不容更改的, 如不遵守, 便会被认为是偏离原文。译文看似严谨, 读来却尤为晦涩。最后是翻译理论的规约再现。围绕“作者中心”这一基本点, 翻译活动围绕作者展开, 作者意图就是意义的本源和终极的参照, 译者只是借由语言表达作者意识、借由文本表达作者意图的忠实“仆人”。重建作者原意、忠实原文成为翻译的最高宗旨, 也是译者开展翻译活动的根本原则, 译者

作为被动受体的身份被禁锢, 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主体性却被完全掩盖。传统译论中前有支谦“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 道安“五失本, 三不易”, 彦琮“宁贵朴而近理, 不贵巧而背源”, 玄奘“五不翻”等译论强化“佛法”“原文”的权威性^[4], 译者是教义的信徒, 在翻译作者作品时应具有敬畏之心、虔诚之意。译者对人类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贡献不可置疑, 但毫无自主性可言的译者隐形于译文, 译者的主体性丧失, 译者沦为主人的“技术工匠”, 其翻译“手艺”将原文的内容完整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 只是其谋生的手段^[5]。“奴性”成为译者的典型特征,“名从主人, 唯主是命”成为传统译论时期的译者伦理规范。

三、结构语言学时期的女人身份与“女性”伦理

20世纪西方哲学进入语言学研究鼎盛时期, 由认识论主体哲学发展为语言论解释哲学, 语言学理论蓬勃发展, 翻译理论研究受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较大, 发生翻译语言学研究转向, 翻译的科学性研究成为新的趋势^[6]。翻译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忠实”——如何忠实于文本, 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主体转变为文本。

(一) “女人”称谓与身份

就译者称谓而言, 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以两性婚姻及其权力话语关系呈现。译者扮演翻译婚姻契约中的女性角色, 然而她却“漂亮而不忠实, 忠实却不漂亮”, 将忠实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女性, 使译者具有衍生性与女性化的特征。这一时期在中外翻译理论与实践, 译者与关联各方的关系被重新解读: 作者与原文成为婚姻体系中的“男性”“阳性”和“主动方”; 译者和译文则多被描述为“女性”“阴性”与“被动接受方”。翻译过程就是研究如何使“女性”(译者)对“男性”(原文作者)忠实, 如何“等值、等效”地转换语言。借助两性关系来隐射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 成为译者身份认知的主要途径。客观上, 这些称谓表面上只是借用女性称呼语来指代译者, 实际上却否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有的地位, 本应成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却充当了男性(原文文本)的依附, 且这位女性(译者)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使男性(原文文本)得到满足, 更不可能得到婆家(目的语读者)的认可。这些论断贬低译学研究价值, 充斥着对女性的歧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女性”角色, 其存在的价值仅在于迎合与忠诚于男性(原文作者), 无意间成为主动受体, 将自己边缘化, 成为男权社会文化视

阈中女性的代名词。

(二) “妇道”伦理

“妇人自当守妇道。”究其身份定位的缘由,不难发现译者主动受体身份的产生与近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关系紧密。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重心在于“忠实”,译者在寻求确保“女人”忠实于男性、忠实于家庭的方法,寻找各种不同层面的对等,使用数据和公式来阐释翻译现象,找寻翻译的“乌托邦”。这种对“忠实”的过多要求及对译者的苛求,客观上产生了两种转换语言隔阂,主观上导致译者主体性的缺失。结构主义时期,无论中西方译者所谓的演变还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都体现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作者中心论”的否定,强调对文本的理性分析,“文本”成为这一时期的翻译主体,原文作者被放逐,译者被“女性”身份所囚禁,身居牢笼,委曲求全^[7]。保持中立成为译者生存之道及遵循的基本伦理,兼顾译文与原文、读者与作者,坚守“妇道”成为译者的伦理特征。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文本选择。译者拥有了一定的文本自主选择权,在相对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可以对文本进行选择,然而文本拥有绝对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第二,翻译原则。围绕“文本中心”这一基本点展开翻译活动,文本成为意义本源和终极参照,译者只是借由目的语言传递文本内容、借由文本复制“男性”旨意的忠实“妇人”。忠实表达原文成为翻译的最高宗旨,成为译者翻译的根本原则,译者的被动受体身份得以延续,与语文学时期宗教翻译的译论相比,仅为被动施事者的变化。译者隐身于男权社会,译者隐形“等值”“对等”框架中。“译从等值,唯文是命”成为结构主义时期的译者伦理规范。翻译标准的核心价值体现为对等,在任何层面上,译者都在寻求如何忠实地再现原文,忠实地履行译者忠诚伦理。第三,翻译策略。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由此,译者作为主体的主观实践能力和作为客体的主观能动性被消解,禁锢于形式语言符号的结构牢笼中,文本成为意义的主宰,翻译只是纯粹语言间的转换活动。一方面,作者的中心地位得以释放,文本的权威地位得以确立;另一方面,译者主体仍未取得应有的地位,一味强调“等值”,最终使翻译研究陷入了困境,阻碍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研究焦点始终对准客体文本,翻译的主体则被排除在外。这一时期的语言学派过于关注语言的确切性,刻意寻求各翻译单位的“等值”“等效”转换规律与普遍原则,从而忽视了语言文化间的差异,特别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为“如何忠实”,对译者“妇道”伦理的探讨是译者对文本

忠实层面的讨论。

四、解构主义时期由叛逆者到混血儿的“职业”伦理

20世纪80年代后期,翻译研究的重点从研究语言单位转移到文化和功能。随着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中西方翻译研究发生了描述翻译学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导致翻译研究概念模糊、研究范畴扩充及翻译研究形式多样。翻译研究从形式规范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的跨学科研究,超越了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定势,将翻译研究置于语境、历史和社会规约等社会层面,超越语言研究范畴。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施事者,成为权力的化身。译者隐身的咒语被解除,译者主体性地位进一步彰显,译者身份得以重新解构,成为了翻译活动的主宰。

(一) “叛逆者”到混血儿称谓与身份

翻译被看成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译者在语用和审美层面上寻找最佳答案的过程。译者成为这一创造过程的主体,成为“创造性叛逆者”。译者不再是原文的被动接受者,而转型成为目标语的再创造者。译者变身为作者,成为无须依附原文而独立存在的个体。译者可以使译文成为原文,并将原文的生命加以延续,从而使译者这一翻译主体的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得以强化。译者——在权力与权威、忠实与背叛、理想与现实间游弋的“变色龙”,已从“原形毕露”到“飞龙在天”,实现译者与原文的共谋,使译文摆脱从属原文的地位。译者或者过分强调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以强化对翻译活动的制约,或者译者的主体作用被过分放大,译者成为绝对权威的“叛逆者”。译者具有社会性,译者的创造性具有社会属性,翻译社会学学者皮姆提出,译者不应被“约定俗成”地视为使者,从属于某一种文化。在他的翻译比喻中,译者不单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更是翻译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协调者”,是居住在交互文化空间里的“混血儿”^[8]。

(二) “职业”伦理

解构主义研究阶段,翻译研究摆脱语言转换的禁锢,回归到对各种伦理问题的探讨,译者职业伦理意味着译者必须始终以追求最优秀译本为天职并忠诚于自己的职业操守。学者们试图从译者的文化间性出发重新思考翻译活动中的伦理问题,构建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伦理,而并非是以以往对翻译进行评判的翻译伦理。译者伦理体现在对翻译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的“职业化”操纵过程中^[9]。

纽马克提出再现伦理, 译者的最重要职业职能是再现原文或原文作者的意图, 不得对原文随意更改。译文应再现原文的基本特征, 应忠实于原文作者的意图, 还应复制并反映原文作者的风格, 寻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最大程度的对等。译者的翻译再现伦理应以“促进各语言团体之间的理解与和平, 阐释各民族文化差异, 促进各国信息技术交流, 将人文艺术领域里极具道德、宗教和美学价值的作品及科技作品展现给世人”^[10]为已任。

服务伦理将翻译行为视作译者为客户提供的一种商业服务。翻译委托人在给译者指派翻译任务时, 应详细地向其交代翻译目的、目标对象、时间、地点、场合、媒介以及译文的预期功能。其后, 为了规约译者行为, 诺德在功能翻译理论中加入了“功能加忠诚”原则^[11]。

交际伦理把翻译视作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翻译的目的不仅仅是再现“他者”, 更是与他者的沟通交流。皮姆从译者文化间性出发阐释译者伦理, 认为译者作为翻译这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协调者, 是居住在“交互文化空间”里的“混血儿”。“交互文化”指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交汇重叠的文化^[12]。译者的文化归属由译者的迁移属性所决定, 译者熟悉两种语言文化这一前提决定了译者在主观层面和社会层面上向源语文化及目的语文化之间的中间位置靠拢。因此, 译者首先应该忠诚于位于“交互文化空间”里的翻译职业, 遵守翻译职业规则及程序规范。

切斯特曼指出翻译策略的选择取决于规范伦理, 实施规范伦理的目的则实现了四种译者职业伦理价值: 明晰、真实、信任与理解。“明晰”指信息接受者在合适的时间内识别发送者意图。“真实”指译文应根据翻译情境的需要, 尽量真实地反映原文的面貌。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富有弹性, 译文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与原文的相似性。“信任”指的是交际各方彼此互相信任。委托人信任译者, 译者信任原文作者, 译者信任译文读者, 译文读者信任译者, 译者的个人品质和职业素质应该取到交际各方的信任, 这是职业译者赖以生存之根本。“理解”意味着译者应该尽量减少实际读者对文本的误解及被排斥在理解之外的潜在读者的数量^[13]。

译者的“职业”伦理在翻译活动中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 一是文本选择。译者作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存在, 体现译者个人伦理, 但同时译者也成为一种职业, 需要同时兼顾职业伦理与市场伦理, 文本的选择更多考虑赞助人及市场需求, 体现一定的趋利性, 但同时带来了市场的繁荣, 其叛逆性是相对的, 而非绝对的。

二是翻译策略。并非是归化策略与异化翻译的对立, 两种是一个整体概念, 相互补充。异化翻译策略是一种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的主动干预, 刻意保留原文中的异质, 旨在限制归化翻译所带来的“翻译种族中心主义的暴力”, 彰显异国文化的语言文化特征, 是将归化翻译法所排除的异质, 重新纳入研究范畴。这一阶段是以译者的出场现身以及译者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为译者主体身份彰显的主要标志, 译者伦理成为译文价值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由政府组织的大型翻译活动中, 翻译策略的选择由官方来决定, 译者的主要作用在于履行工作职责。三是翻译原则。胡庚申提出译者表面上成为翻译活动的主宰, 但译者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会权衡翻译活动的多维因素, 遵循多重译者伦理, 寻找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译者进行“多维度(语言、交际与文化)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亦即译员在翻译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在多维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 作出符合翻译生态环境适应性的“选择”^[14]。皮姆因此提出遵循译者伦理的5项原则: ①译者要对译作负责。“该不该译”成为翻译伦理的首要问题。②译者要对其翻译职业负责, 要遵守职业规则和程序规范。③译者处于“交互文化空间”, 不是文化对抗的工具, 个人的翻译行为并非依附于单一文化标准。④翻译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不易超过为改善两种文化间关系所带来的收益。⑤译者的工作应该促进两种文化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15]。可见, 解构主义时期, 译者主要遵循其“职业”伦理。

译者身份流变过程是译者主体得以突显、译者伦理变化的体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忠实”特征成为上述三个时期的译者伦理共性, 但三个阶段的忠实表现层面与对象的差异, 使各阶段的译者伦理、翻译理论各具特色: 宗教翻译时期的译者被冠以“仆人”之称, 体现“奴性”伦理与仆人宿命, 是译者忠实对待原作者和统治者的无奈; 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译者变身“女人”, 体现“妇道”伦理与女性隐忍, 是译者忠实地对待文本的委曲求全; 解构主义时期从叛逆者到混血儿, 体现“职业”伦理, 是译者忠实对待自己职业的自觉意识。面对如此多样的译者伦理, 我们认为, 对不同时期不同译者伦理深入的理解与辨析, 充分说明译者伦理研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价值体现。

五、结语

文章梳理了译者身份的流变, 译者成为翻译活动焦点的同时, 也成为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结点, 译

者主导翻译过程,其中心地位与主导作用不可替代。翻译是面向“他者”的,译者对“他者”的态度成为译者伦理的反映。无论是宗教翻译时期的“奴性”伦理、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的“妇人”伦理,还是解构主义时期的“职业”伦理,译者身份与译者伦理构成互证关系。译者伦理可反映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译者活动的规约和期待,翻译活动变化、翻译理论发展为译者身份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当代译者更应将翻译制度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内化为译者内心信念的个人伦理,并外化为其翻译实践活动中的职业伦理,以实现译者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变,使译者成为真正意义上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协调者”,防止译者主体性遭遇困惑而走向衰落,关照译者身份的跨文化、社会本质特征,彰显译者伦理研究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海明. 伦理学方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2] 李民. 论译者角色的伦理特征[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6): 77-80.
- [3]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4]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 [5] 颜方明.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4(4): 259-263
- [6] 潘文国. 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 外语界, 2016(1): 6-11.
- [7] 单宇, 范武邱. 中西译者称谓变迁与翻译主体构建[J]. 湖南社会科学, 2016(4): 187-191.
- [8] Pym, Anthony. Introduction: 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he Translator*, 2001(2): 129-138.
- [9] 王莉娜. 析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J]. 外语研究, 2008(6): 84-88.
- [10]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9-42.
- [11] Nord, Christi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14.
- [12] 刘云虹. 译者伦理: 身份、选择、责任——皮姆《论译者的伦理》解读[J]. 中国翻译, 2014(5): 18-23.
- [13] Chesterman, Andrew.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J]. *The Translator: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01(2): 139-153.
- [14] 胡庚申. 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 中国翻译, 2014(1): 29-35
- [15] 管兴忠. 安东尼·皮姆翻译思想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2): 86-91.

Translator's ethic reflection with changing of translator's identity

SHAN Yu, FAN Wuq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By probing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or's identity and translator's ethics wit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essay discusses the external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nal reasons of translator's ethic reflection in the evolving process of translator's identity. The translator's appellation and subjectivity constitute the extern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ranslator's ethics, and the text selection,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methods,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the internal reasons. At the Philology Age, translators were recognized as "servants," who were required to be faithful to their "masters," that is, the original works and the rulers. Such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servility ethics. At the stage of Linguistics, translators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how to be faithful," with their identities being regarded as "female." Women's ethics has been the dominant ethics which the translators followed. And in Deconstruction period, translation studies turn to such ethical issues as "creative treasurers" and "blendlinge,"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finally becomes the subject, hence manifesting his professional ethics as a translator.

Key Words: translator's appellation; translator's identity; translator's ethic; ethic-reflection

[编辑: 苏慧]